

香港经济增长特征

XIANGGANG JINGJI CHENGZHANG TEZHENG

港澳研究丛书

郑德良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香港经济增长特征

郑德良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香港经济成长特征

郑德良 著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6万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306-00102-7

F·19 定价：1.50元

GD 15 / 10

序 言

我同国内大多数经济学研究工作者一样，是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身的。早在30年前，当吴大琨教授率先建议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增设世界经济专业时，我就积极争取转为第一批世界经济专业学生。可惜，由于当时种种原因，这个极有远见的设想未能实现。不过，我却没有放弃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最初，我集中研究战后美国经济周期，希望抓住这个突破点，研究当代最发达、最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演变及其结构和存在问题。后来，由于当时学术领域内的不正常气氛弥漫，我不得不放弃美国资本主义这个具体研究对象，转向一个更为学术化的题目，就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中间性危机。这个题目在两年后，就成了我的毕业论文。为了做这个题目的研究，我投入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就在这段时期我从门德尔逊、瓦尔加等一批苏联学者以及维克托·佩洛、罗滨逊夫人等一批著名西方学者当中对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到更多的了解。我那篇长达四万多字的论文最终完成了，但可惜原稿在“文革”初期被烧毁。后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想不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批学者又重新提出中间性危机问题的讨论，再次引起我的注意。不过，我已再没有精力和时间去重新做这方面的研究了。尽管这样，却由此给我一个强烈的讯号：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再度成为经济学界一种正常的

学术活动，并预示着一个新的学术繁荣时代的兴起。

从60年代开始转辗在广东这一、二十年的社会经历，凭藉我过去的学术经验，我发现香港、澳门这两个与广东相邻的自由港所沿袭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同我过去所了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存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当我着手全面整理和研究香港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成长资料时，虽然已明确提出“香港是现代化工业发展的特殊典型”，^①不过，鉴于当时国内绝大多数读者尚未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资料，我不得不首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香港经济现状和特点，香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及其某些经验”（引语同上）。开始，没有从理论的高度对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典型”作出更详尽的分析。现在看来，是本书的不足之处，但就当时条件来说，读者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拙作《现代香港经济》和《香港经济问题初探》先后出版后的这五六年里，国内不仅在香港经济，而且在其他领域的研究，已有飞跃的发展^②，人们要求对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性质和特征有更深刻的了解是理所当然的了。从国外来看，一些眼光锐利的西方观察家，也提议我们应该把香港作为资本主义“一个最佳范例”加以深入研究^③，因为“香港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同^②）。在我近年

① 参见拙作《现代香港经济》初版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7月，北京。

② 参见《港澳研究》1986年创刊号及《港澳经济》1986年第5、6、7各期。

③ 1984年4月26日，加拿大《国际日报》社论。

来所看到的许多海外学者的论著中，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苏耀昌博士“从世界体系学派的角度看香港的经济成功”^①一文，要算是最精彩、最有启发的一篇文章了。作者认为迄今为止，所有对于香港经济成功的解释，都是不够令人满意的。因此，必须转向从“世界体系学派”中寻求新的解析。本人很感谢作者，他把我的著述中的有关观点也列入这个“世界学派”的一部份。这种学术思考方法及其结果，即使还有可讨论之处，但肯定是一个重要尝试。

就我个人来说，由于认识上的发展以及招收港澳经济研究生培养计划实施的推动，早就希望对我在几年前提出的问题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三十年前的恩师吴大琨教授给我的启发。他在1981年送给我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这一精彩著作，就象给了我一把打开深入了解香港经济发展模式大门的钥匙。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坤耀教授为我在香港长时间深入研究香港经济和亚洲经济问题提供了良好机会和条件，并多次毫无拘束地讨论了双方感兴趣的“四小龙”经济发展问题。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张伍常教授更是出乎我想象之外，以爽朗态度花时间去回答了有关政府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并把他的两本精彩著作送给我^②。香港立法局议员、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宏发先生更是就有关香港的政制与行政方面问题同我进行了多次的讨论，使我在这方面知识更为充实。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研究中心主任刘兆佳教授也热诚地聘请我为该中心的荣誉研究员，并为

①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1986年创刊号第13页。

② 《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

我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香港理工学院高级讲师刘佩琼小姐、刘爵荣博士，中文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薛天栋博士、讲师宋恩荣博士以及国际企业和市场系的闽建蜀教授，香港大学地理系高级讲师薛凤旋博士和经济系饶余庆教授、高级讲师蔡俊华博士以他们精粹见解和广博的专业知识，每每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日本东京大学国际交流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相川宏先生也就香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问题两次相约座谈，给我不少启发。此外，香港不少官方与半官方机构、商业公司、银行界的朋友也曾许多方面对我的研究提供不少帮助，其中刘迺强先生尤为热心。

这些年来，在我的学术研究过程中，《经济导报》社的先生，特别是陈可珉教授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不但在资料上给我支持，而且他每次关于“香港学”问题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而我的多年挚友甘长求副教授也和陈教授一样，对我的请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使我在各个时期解除了资料供应短缺的困难。当然，以古念良先生为首的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的朋友，还有老前辈赵元浩先生以及中山大学的领导和经济系的同事，都对我的研究给予很大鼓励和支持。好几位研究生和本科同学也给我不少帮助。

象国内许多学者一样，我的得力助手和第一个忠诚读者还是我的妻子程少玲女士，她多年来为我的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很难用简单的文字说清楚的。

中山大学出版社虽然在国内的重点大学中还是一家较年轻的出版社，但我却为能在这里出版拙作感到荣幸，并特别感谢刘翰飞、方绪源两位先生所给予的合作和支持。

同过去一样，如果拙作能为国内近年掀起的“香港学”

研究热潮增添一点新的学术气氛以及为繁荣香港，增进香港同内地之间的更多的了解和合作的话，那是时代推动的结果。

郑德良 1987年12月
于中山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香港的历史发展与	
“一国两制”	(1)
第一节 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的重现	(2)
第二节 东方文明社会停滞的原因及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评价	(4)
第三节 世界历史发展的“多线图式”与一国历史发展的双重模式	(9)
第四节 香港的历史发展与“一国两制”	(11)
第二章 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特征	(17)
第一节 自由经济形成的特殊条件	(18)
第二节 香港的开发与殖民统治	(21)
第三节 香港的移民经济与一般政策	(25)
第四节 平衡市场利益的冲突与香港的公营企业经营	(27)
第五节 宏观经济管理“积极的”方面	(29)
第三章 香港企业体系的混合形态	(31)
第一节 香港企业的历史来源	(31)
第二节 香港企业体系的组合成份	(36)
第三节 香港华人企业的经营形态	(39)
第四节 跨越政治空间的“家乡企业”成长	(45)
第四章 发展不平衡的香港小型经济	(48)
第一节 小型经济的困境与出路	(48)

第二节	有限空间与产业规模扩大的冲突·····	(51)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特征·····	(54)
第五章	出口导向与“逆差贸易”的动力特征·····	(59)
第一节	从转口贸易到加工出口贸易的转化·····	(60)
第二节	工贸结合的结构模式·····	(64)
第三节	“逆差贸易”的形成及其平衡·····	(68)
第四节	出口导向与经济外向发展关系·····	(73)
第六章	香港工业发展与技术进步特征·····	(76)
第一节	低成本竞争的工业发展优势·····	(77)
第二节	从低成本竞争到高成本竞争的转变·····	(82)
第三节	工业发展的技术进步倾向·····	(89)
第四节	技术转型期的未来发展趋势·····	(94)
第七章	地产业金融资本化与周期·····	(98)
第一节	香港的土地产权制与供应来源·····	(98)
第二节	地产市场的需求构成与土地供应政策·····	(102)
第三节	银行“联合参与”发展和溶合成长·····	(105)
第四节	地产/金融资本运动与周期·····	(112)
第八章	经济成长与香港文化环境·····	(116)
第一节	香港文化环境观察·····	(116)
第二节	香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117)
第三节	香港人与金钱的关系·····	(117)
第四节	香港人与人的关系·····	(119)
第五节	香港人与神的关系·····	(120)
第六节	香港人与自然的关系·····	(121)
第七节	科学与艺术的和谐结合·····	(122)
第八节	中国传统习俗与西方文化·····	(123)

第九节 进步文化与黄色文化的较量·····	(124)
附 录 ·····	(127)
一、香港是怎样迅速实现城市经济现代化的·····	(127)
二、进入低增长期的香港经济及其对策·····	(138)
三、过渡期香港经济考察·····	(144)
四、进入过渡期的经济增长与政策·····	(156)
五、过渡期香港考察记·····	(165)
(一) 港人再创历史奇迹·····	(165)
(二) 屡创高峰的股市·····	(167)
(三) 香港还是个最好赚钱的地方·····	(169)
(四) 学术活动日趋活跃·····	(171)
(五) 工业发展方向的转变·····	(173)
(六) 旁听立法局辩论会·····	(175)
(七) 赛马与赌博·····	(177)
(八) 投资者天堂·····	(179)
(九) 职业妇女中高层圈子在扩大·····	(181)
(十) 香港城市巨变·····	(183)
(十一) 九龙城寨的历史性变化·····	(184)
(十二) 香港股市暴跌引起的思考·····	(186)
(十三) 股市重整有助于香港经济的稳定增长·····	(191)
六、省港经济合作三题·····	(197)
七、广东省与香港经济合作前景展望·····	(202)
八、谈内地的香港研究·····	(211)

第一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香港 的历史发展与“一国两制”

这些年来，在我读到的西方学者的著作中，《马克思与第三世界》^①要算最精彩的一部了。这本书初读起来颇令人乏味，不少地方还不大好懂，幸好我先聆听过吴大琨教授在广东社会科学院就这本书所述及的问题的一次演讲，多少有点印象。后来，我又反复读了经过他修订的记录稿^②，感到这本书所提到的问题，的确是中外学术界中一个“爆炸性”问题。以后，我在研究香港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特殊问题时，反复读了三、四遍，还参看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田昌五的《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斯蒂芬·F·梅森的《自然科学史》以及马克思的有关著作，直到最近，才勉强可以说，我对这本书所提到的几个重大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即使是这样，我已感到收益非浅了。特别是在研究“一国两制”这个重大问题上，只要将这本书中所复原的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概念科学地向前推进一步，就

① [意]翁贝托·梅洛蒂著，高钰、徐壮飞、涂光楠译：《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北京版。

② 吴大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0年第一期。

会给人们一个很清晰的说明。它告诉人们，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其中包括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果我们用心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正确地而不是扭曲地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理论武器。

第一节 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的重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社会形态的理论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谜”（田昌五语）。对这个理论，一些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以至科学史家，都有过不少的猜测和解释。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有关古代东方社会发展形态那部分遗稿未能及时发现，而人们又同时不适当地将马克思以欧洲国家为重心的具体（英国资本主义）研究结论加以“普遍化”，并推断到非欧洲的国家 and 地区，以至在近几十年出现的大量学术著作和非学术著作中，都几乎一致地将人类历史的社会发展形态描述为“单线”发展的五种形态，即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及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的作者梅洛蒂教授却在反复考证了马克思在世时发表的著作以及后来被发现的大量遗稿以后指出，马克思不是单线论者。^①作者首先指出，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所概括的社会历史发展图式，只

① 参阅《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9页。

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抽象，“这样一种图式，自然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模式，它不能完全地代表历史。但是，它是一种重要的启发手段，因为它剔除了使历史发展轮廓发生模糊的偶然附加物，从而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所包含的‘逻辑’”^①。问题还在于，马克思研究的主题——资本主义社会，不但不是指任何具体国家（甚至是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在当时，他仅仅把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典型而已。事实上，欧洲以外其他广大地区，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却存在不同的模式，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从小欧洲中心主义出发，试图把欧洲的历史发展提高到“普遍性”模式的地位，既不符合马克思关于欧洲以外各国存在不同于欧洲历史发展模型的原意，也不符合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和地理特点的分析。

作者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叙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广泛存在于欧洲以外的一种二流变动，不能让它湮没在遥远过去的原始迷雾中，也不能不合理地把它提高到普遍性的地步。历史发展表明，欧洲的封建主义，部分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社会矛盾对抗的结果，部分是蛮族入侵的结果；而作为欧洲以外独立存在的亚细亚社会的危机却是由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征服或经济渗透而造成的。换句话说，除了西欧一些国家曾相继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其余五大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没有在历史上自动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②也就是说，在欧洲条件下形成的封建主义

① 《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14页。

② 《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译本前言第14页。

(Feudalism) 社会与长期并存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在科学上把它们区别开来,是科学地看待东方文明国家出现的各种具体历史事件的首要关键。

第二节 东方文明社会停滞的原因及对西方 殖民主义的历史评价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早在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到来之前的千多年里,古代东方文明国家,象埃及、希腊、印度和中国都曾经为古代文明世界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在科学技术发展各个领域都领先于西欧。可惜,直到17、18世纪欧洲的现代科学开始传入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大多处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分离的状态,中国古代科学并未越出思辨的经验主义阶段,以至后来被西欧文艺复兴和接着出现的产业革命所创造的成果远远抛在后面。李约瑟说过:“中国的科学为什么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①我觉得,一些西方学者指出^②,东方国家所固有的“等级区分的农

① [英]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一分册序言,1975年,科学出版社中译本。

② 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6页。

业文明社会”这个特点，只是触及问题的现象，本质的问题，还是由东方国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性质所决定。

根据《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作者所引证的资料，马克思所说的那些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它们最基本的特征是土地归国家或代表国家的君主所有（还存在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在这种土地公有制形式下，作为剩余产品索取方式的租和税是合一的；第二是土地非私有的条件下形成的村社制。每一个村社都是一个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单位（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这成为亚细亚社会的基础；第三是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在水利灌溉工程设施（东方农业基础）方面的建设，成了中央政府的最主要经济职能^①。在文化上“把经济的和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民政的和军事的这许许多多权力都集中一个人身上，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的一种最明确无误的文化特点”。^②

如果说，抓住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一特点，是了解东方国家一把真正的钥匙的话^③，那么这种特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化和阶级结构，可能就是东方古代文明进步和近代停滞的根源所在。亚细亚社会的阶级结构有别于其他社会的特点是剥削者既是管理者又是官僚。^④它从事社会的劳动管理、政务、宗教、司法、科学、艺术等。这个阶级或与这个

① 参阅《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63页。

② 参阅《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81页。

③ 参阅《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64页。

④ 参阅《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71页。

阶级相联系的阶层，可以依靠其担负公共职能的特权而取得大量剩余产品——社会财富的条件，得以进行非直接生产性的科学文化艺术活动。所以，尽管古代东方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村社的生产活动分散，但仍有可能创造出比其他地方更为优秀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当然，这些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大多是与争取农业生产丰收有着十分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就是与军事征服的需要有关。这点同工匠在近代西欧各国科学技术上的活跃表现与创造力显然存在很大区别。

近代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与科技发展重心西移，决不是历史的偶然。在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社会，几乎不具备产生象西欧那种“市民社会”的文化环境，而这种环境正是有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科技发展的内在因素。即使有过一些商业活动，但是，“商业并没有怎样动摇古代印度公社和一般亚细亚的社会关系”^①。这是因为“在亚洲，国家是高于一切的，它完全控制了政治和经济生活，从而阻止了‘市民社会’这样一个自主领域的出现。……用现代的语汇来说，有庞大的国家存在，使这个制度象一架自动调节的数控机床一样稳定，在这个制度中，它的适应性和整体化的职能——这种职能来自极为辽阔的领土和分散的小村庄，并由于其对水利的控制而得到加强——客观上转化为维护现秩序或生存方式的职能”^②。当然，马克思并不否认亚细亚社会有过变化，甚至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只是触动这个制度的表层而没有改变它的经济基础，从而引起生产

① 《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114页。

② 《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115页。